

台灣文學研究
第七期 2014 年 12 月
Taiwan Literature Studies
No. 7, December 2014
頁碼：185~232

研究論文 Research Article

日治初期台灣言論界「文學」概念的變化

Changes in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of Taiwan

許倍榕
Hsu, Pei-Jung

收稿日期：2014年5月7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4年10月8日

Received: May. 7, 2014; Accepted: Oct. 8, 2014

許倍榕，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

e-mail: bairry1112@gmail.com



摘要

本文探討日本殖民統治初期，台灣的「文學」概念從儒學傳統脈絡到新學脈絡的變化。在台灣知識階層中，最早對此概念進行探討的，是1907年謝雪漁撰寫的〈文學辨義〉，該文對「文學」的釋義，已有廣、狹義之分，並開始使用「純文學」的說法，對傳統「文章」未涵蓋的小說、戲曲，抱持較為開放的態度。本文的提問是，何以此時出現這類對「文學」意涵的討論？台灣的社會與既有學術出現了什麼變化，必須去摸索與適應這個新的「文學」概念？而被視為「傳統文人」的謝雪漁，在1907年即撰文介紹這個新概念，顯示知識階層之間一定程度的認識與接受，那麼又何以有後來的新舊文學論爭？本文主要從這些問題切入，回溯台灣現代意涵「文學」的形成過程。由於日治初期日本官方對「漢文」的定位，動搖了傳統學術的權威性，對此台灣人開始積極接受「新學」以改良傳統學術，在此過程中，他們將新的「文學」概念作為一種文明知識納入視域，往後很長一段時間，台灣知識階層的「文學」都未跳脫這種新舊並存的用法，這種「文學」概念，與其說是「變革」，實質上比較接近一種知識的整理，而這種沒有衝突、多義調和的「文學」概念，要待日治中期後才有明顯的蛻變。



關鍵字：文學概念、新學、謝雪漁 (Hsieh Hsueh-Yu)、久保天
隨 (Kubo Tenzui)、文學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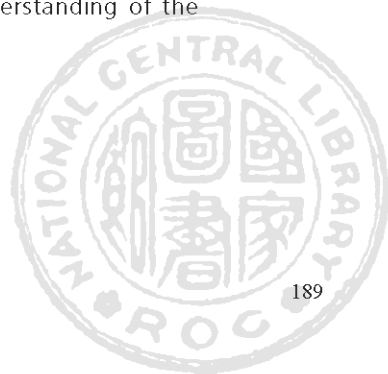


Abstract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was to discuss the transformation in 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 from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to a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yle.

In Taiwan, the earliest discussion about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appeared in the article “文學辨義” by Hsieh Hsueh-Yu in 1907. In this article, the definition of “literature” was described in both a general and a more specific manner. The author also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pure litera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held a more open attitude toward novels and Chinese operatic plays, which were typically ignored by traditional schola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time period during which such discussions appeared in Taiwan. What societal and cultural changes occurred during the time that necessitated the adaptation to the new concept?

The fact that Hsieh Hsueh-Yu, who was commonly regarded as a traditional scholar, wrote the article in 1907 to promote the new concept demonstrated that such a concept was likely adopted in different educational classes. If such an understanding existed at the time, what caused the dispute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new literature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We attempted to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ve process for the contemporary concept of literature in Taiwan by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We believe that the position hel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rs towards “Chinese classics” shook the authority of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scholars of the period. In response to this change, the Taiwanese began to actively incorporate contemporary concepts in order to transform and improve the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literature. In this process, they accepted and absorbed the new concepts as “civilized knowledge.”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the perception of “literature” was generally accepted as the co-existence of both the old and the new. Instead of a revolutionary proce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culture is better described as a rearrangement of knowledge. Such a conflict-free and encompassing view toward literature persisted until the later stages of Japanese colonization.

Keywords: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New study, Hsieh Hsueh-Yu, Kubo Tenzui,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正文

前言

關於台灣「文學」概念演變的探討，其實涉及了西方近代「文學」概念在漢字文化圈的發展。已有許多前行研究指出，1895年後，清政府陸續推出教育改革，傳統學術面臨結構性的重整，過去作為學術總稱的「文學」意涵也產生深刻的轉化，特別是作為「學科」，逐漸被整備為一門專業領域。日本明治前半期因洋漢並進政策維繫下來的漢學傳統，以及伴隨著漢學回潮而出現的漢詩興盛，也在這一年前後產生明顯的變化。在此之前，日本知識階層對中國文化的親緣性尚持尊重態度。甲午戰爭後，儘管漢學及漢詩文仍被視為日本學術文化的重要組成之一，來自中國的影響卻逐漸被稀釋，甚而負面化。稍早之前，融合了漢學知識傳統與西方人文學觀念的廣義文學，開始被狹義文學所超越，並在1910年前後大致穩定下來。相對於中國、日本，1895年成為殖民地的台灣，又會面臨什麼樣的課題？這裡所面對的新式學術衝擊與漢學存續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學」意涵變化，又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

探討日本殖民統治前台灣的「文學」，我們可能會想知道，今日



稱之為「文學」的東西，過去以什麼型態存在、發展？而「文學」這個詞彙歷來又意指什麼？前者可見於現有的各種文學史，它們以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逐漸通行的現代意涵「文學」（以語言為表現媒介的藝術），重新織理與描述以往的文化資料。以台灣的文學史來說，目前我們所見除了漢文文獻之外，也有上溯原住民的口傳藝術，或重新評價早於新文學運動的口語文書寫，如使用廈門音羅馬字（白話字）刊印的《台灣府城教會報》等，這些文學史敘述分別從文字、語音、口語文角度出發，回溯詩歌、小說、戲曲、散文等今日被歸於「文學」部門的物件。這些口傳及文字資料過去被傳承或書寫時，也許緣於各式各樣的理由，在當時的社會有其特定意義與作用，而非基於我們事後回顧時所帶有的體裁意識與審美目的，或將其視為一個名為「文學」的獨立領域——事實上當時的社會可能也沒有這樣的需求。至於相對其他領域而自成一門專業的「文學」約莫始自何時？大抵常見於辭典及文學史裡對於「文學」的釋義，以及該詞彙歷來意涵的梳理與彙整。無論我們今天認知的「文學」過去為何物？或「文學」歷來意指什麼？在目前多數的文學史及文學研究裡，基本上是沿用已確立（同時也先驗化）的「文學」概念進行討論與詮釋，在回顧「文學」意涵演變，以及過往的「文學」資料時，較少將這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獨立領域」之形成過程予以問題化，即何以這樣的需求產生了？儘管許多前行研究讓我們認識到，這種「近代化」源自西方帝國主義的強制，而這種強制的結果帶來國家制度、社會經濟結構以及個人精神構造的變革。在此變革中，「人」從封建身份解脫，在思想與感情的表現上更為獨立而自由。過去我們大抵在此脈絡下肯定「文學」的出現，視其為必然趨勢，但除此之外，是否還存在一些我



們較少觸及的問題？被視為近代化指標之一的「文學自律」，難道不存在雙面性甚至多面性？畢竟它的形成不僅是人的解放過程，同時也是國家體制化的過程。本文希望通過台灣十九世紀末以後「文學」領域的出現與演變，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在目前可見文獻中，台灣人直接針對「文學」意涵進行討論的，是1907年刊載於《漢文台灣日日新報》的謝雪漁〈文學辨義〉（當時謝氏已開始在該報上課介久保天隨的《支那文學史》）。從該文對「文學」的釋義，可以看出當時台灣知識階層對「文學」的認識，已有廣、狹義之分，並開始使用「純文學」的說法，對於傳統「文章」未涵蓋的小說、戲曲，抱持較為開放的態度，顯示出對現代意涵「文學」的初步把握與接受。於是我們要問，何以此時出現這類對「文學」意涵的討論？台灣的社會與既有學術出現了什麼變化，使之必須去摸索與適應這個新的「文學」概念？而被視為「傳統文人」的謝雪漁，在1907年即撰文介紹這個新概念，顯示知識階層對此概念已具備一定程度的認識與接受，那麼又何以會發生後來的新舊文學論爭？本文將從這些問題切入，回溯台灣現代意涵「文學」的形成與發展過程。此觀察作業將從當時的言論界著手，這裡所謂「言論界」，是泛指公眾發表議論的媒介¹，文中討論的年代，則以1895至1907年謝雪漁〈文學辨義〉一文出現為止，約日治初期12年期間。

1. 以日本殖民統治初期而言，目前較容易蒐集與掌握的資料主要為報章雜誌。在報紙方面，雖然日治初期台灣北中南已繼續出現發行日報的報社，但目前可見資料有限。《台南新報》（原名《台澎日報》）僅存1921年~1937年份，而《台灣新聞》（原名《台中每日新聞》、《中部台灣日報》）也僅見少部分年份，無法窺見兩者在日治初期的面貌。因此，本文在日報方面主要以《台灣日日新報》為考察依據；雜誌方面，則以台灣圖書館現存的《高山國》、《にひたか》、《台灣文藝》等早期日人刊行的雜誌，觀察部分日人公開媒體的「文學」用例，以及台、日人讀者皆有一定人數的《台灣教育會雜誌》；此外，也會旁及部分當時公開出版的書籍。

一、日治以前，與日治初期的「文學」

〈文學辨義〉刊登前後，可能是台灣人對現代意涵「文學」概念初步摸索的時期。此前台灣歷來的漢文文獻，如方志、詩文集或各類著述中的「文學」，大抵不出漢字文化圈「文學」一詞所涉及的範圍，即學術、經籍文獻、教育、官名、有學問之人，或偏向寫作的文章、文才等，其意涵伸縮性雖大，基本上都需放在以儒學為主的學術體系中理解。而我們今日歸類為「文學」的詩文，則常以「藝文」、「文藝」、「文苑」，有時也以「文學」等統稱之，作為士大夫階層的教養，統合於維繫君權制度與階層秩序的經學體系中。²

這些寬泛的用法，到了日本殖民統治初期仍延續著。不同的是，由於受到西歐近代藝術觀念的影響，在一八八〇年代中期之後的日本文壇裡，過去與「學問」（漢學）緊密相連的「文學」，逐漸被轉換為「藝術」（與學問並立的概念）之一環。³ 其後，在日本言論界出現了關於廣狹義文學的議論與競爭⁴，但新的概念仍須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得以穩定下來。因此，在明治二〇年代（1887~1896）基本上仍以綜合漢學知識傳統與西方人文學觀念的「廣義文學」佔據主導性地位。此時期談及「文學界」、「文壇」時，所指的是言論界、論壇，涉及較廣泛的寫作，包含哲學、歷史、思想、政治、宗教等，相對於此，則出現指稱狹義文學的「美文學」、「純文學」、「軟文學」等用語。其後狹義文學的推進，乃至超越了廣義文學，成為「文學」的主要意涵，可歸結於諸多因素，例如當時日本正面臨國民文化探索與規劃的時代課題，詩歌、戲曲的改良運動陸續出現，帶有與西歐文明競爭的意識而翻譯模仿的詩、小說也在知識階層中流行起來，



西歐近代藝術觀念與特定文類受到關注，許多同人組織相繼結成並逐漸壯大且蔚為勢力。到了明治三〇年代（1897~1906），談到「文學界」、「文壇」時，已多有指向詩或小說團體的傾向。⁵另一方面，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前後，日本的民族主義急速發展，這種日本本位的強化，其實也帶有某些促使狹義文學發展的推進力。⁶就在此日本的「文學」逐漸由廣義朝向狹義轉化的時期，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儘管在1895年後，日本漢學傳統的權威性明顯弱化，但在語言藝術尚未成為「文學」主要意涵的時期裡，在台灣流通的各式日、漢文的著述刊物上，「文學」一詞仍舊指涉廣泛。在日治初期的出版品中，我們不時看到廣狹義文學並陳的景象，當時「文學」經常意指文

-
2. 中國史書及方志中的「藝文志」，源自班固《漢書》，是「專以辨章學術、著錄載籍」，將圖書典籍編成目錄，而方志中的「藝文」，則「多甄錄詩文」。（高志彬，〈清修台灣方志藝文篇述評〉，收錄於許俊雅主編，《講座FORMOSA：台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台北：萬卷樓，2004年）。）因此在清代官修的台灣方志裡，可見甄錄詩文的「藝文」（或稱「文徵」、「文藝」）的門類。而「文學」一詞之使用，則時見於敘述人物事跡的門類，如清光緒十九年（1893）薛紹元《台灣通志》中的「列傳」裡，有子目「文學」，即列敘有才德之人物（台北：大通書局，1987年）；清光緒二十年（1894）林豪《澎湖廳志》裡的卷七「人物」，亦有子目「文學」，記述有學問及能文之人（台北：大通書局，1987年）。
 3. 鈴木貞美，《日本の「文学」概念》（東京：作品社，1998年），頁190。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頁159。
 4. 同註3。其中第七章「概念的鬥爭」（頁185-211），作者依循越智治雄（1929~1983）的論點，探討明治20年代多位站在廣義文學概念的評論家，與力圖推進狹義文學概念的評論家之間的寫作觀論爭。
 5. 參考來源同註3，頁220。
 6. 明治時期以來，在型塑一個近代「日本」的同時，日本領導階層及知識人在漢學、日本國學、西學之間出現各種對立或調和的立場，但總體而言，站在日本本位而借重傳統漢學與西方近代學術的路線仍是主要走向。甲午戰爭後，由於對中國的蔑視，傳統漢學的權威性逐漸滑落，從德川時期國學者如本居宣長，到明治時期的小說家坪內逍遙，乃至編寫《支那文學史》或《日本文學史》的學者，在確立「日本」時所設置與強化的「漢／和」特徵（例如儒學之「理」，相對於日本之重「情」傳統），更頻繁地出現於媒體上。而這種對描寫技法、情感、虛構想像等的重新評價與重視，與西歐近代藝術觀念脈絡的狹義文學有容易結合的特質。

教、學術、博學之人、文章、言論界、能文者⁷，而逐漸發展的語言藝術文學觀，也開始散見於當時台灣流通的報章雜誌。⁸可以推測台灣知識階層透過這些有限的媒體，開始接觸不同意義的「文學」，也可能提高對特定文類的關注，但影響層面仍有限。初期由於官方的懷柔政策，暫時保留傳統以儒學調節、維持社會秩序的運作模式，知識階層與傳統學術的依存關係仍穩固，新的概念很容易被整合進既有的知識體系。這種穩定關係之所以開始產生變化，且台灣的漢人社會開始感到有必要重新把握與辨別「文學」，應該與日本官方在台推行的教育政策與文化統合，明顯衝擊甚至改變了既有學術體系（同時也是知識階層的教養與社會威信），使過去包攝在傳統學術中，有時即意指學術總體的「文學」，開始產生內質的變化有很密切的關係。而最初的裂口，來自日本官方在重整台日權力關係時所架構出的「漢文」社會定位。

二、傳統知識體系的動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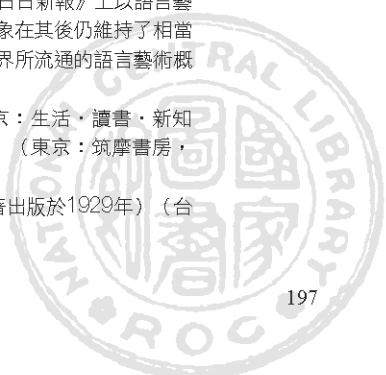
（一）日本殖民統治原理及統治初期的籠絡政策

竹內好在探討中國與日本的近代化變革時，以強烈措辭批判明治維新的成功，是因為「日本對歐洲幾乎沒有表示出任何的抵抗」。⁹這當然並非意味著在日本的近代化過程裡沒有出現過任何掙扎與反動，只是，這個迫於西方侵略壓力而急忙步出的「近代化」，讓日本政府為了打造出與歐洲列強同水平與同型態的國家，同步推動了立憲政治、資本主義經濟與對外發展，其透過憲法與《教育敕語》確立天皇



極權國家體制、著手整飭資本主義經濟機構，繼而在未受資本壓力而須奪取殖民地的經濟力下，即投身帝國主義的領土競爭，開始對外擴張。¹⁰ 而這種對列強的危機感與競爭意識，卻沒有「讓日本反省西方

7. 如1896年權藤震二《台灣實況》裡「文學及宗教」的單元，其「文學」部分即探討台灣的文教及學術。（東京：東京法學社，1896年，頁59-62）。《台灣日日新報》上也常見多義並存的「文學」，如1899年1月24日的漢文版，題為〈聘請文學〉之文，即意指博學文士；同年7月4日，題為〈裁判文學の必要〉，則探討文章寫作及習字的重要性；同年9月2日，峽堂生〈文學小觀〉，文中的「文學」是指較廣泛的寫作，涉及評論、表現思想感情或娛樂取向的各種書寫，文中的「文學界」可理解為論壇、言論界，而活躍當中的知識階層，特別是能文之人，則稱為「文學家」；類似用法也出現在同年10月28日番太郎〈文學通信〉一文，該文語帶戲謔評論多位在台日人，如《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任初山衣洲、活躍於產業新聞雜誌《にひたか》的山田英峰、時事評論雜誌《高山國》的中心人物照山等人，這裡的「文學」，也是意指言論界，偏向較廣義的寫作；又如1901年題為〈文學淵藪〉一文討論德國學術，其「文學」意指學問等。
8. 如《台灣日日新報》1899年12月刊載小西增太郎〈露西亞文學とトルストイ〉的連載文章，該文通過俄國文學與托爾斯泰，探討寫實、社會觀察、心理描寫等小說寫作的課題；在日本開始討論「國語」方案的年代，1902年6月於《台灣日日新報》開始連載的宇野秋皋〈謠曲文と日本文學〉，從文體問題出發，主張取法日本傳統「謠曲文」（日本傳統歌舞劇「能」的腳本）和漢文融合、雅俗折衷的文體，文中的「文學」，已顯見受現代意涵「文學」及近代「文學史」觀念與描述的影響，強調透過語言表現思想、感情與想像。此外，報刊上的雜誌讀物廣告，也構進各類「文學」資訊，這些訊息可能也促使閱讀者開始接收「文學」的各種內含成分。例如，在1903年1月18日的《台灣日日新報》裡，有大日本文學會發行的《文學講義》圖書的廣告，其列舉第一號的內容為「國文、國歌、俳句、漢文、漢詩、英文、英詩、文學概論、散文作法、韻文作法、日本文學史、支那文學史」。即便尚未成為一種穩定的概念，亦可以想見當時一個統稱為「文學」的特殊領域正在被整合及確認內涵。1904年2月20日，《台灣日日新報》刊登「日露戰爭文學募集」，徵求詩歌、俳句、新體詩、軍歌、俗謠等，雖然傳統上也有使用「文學」總括詩文的用例，但此時期使用「文學」一詞的趨勢頗值得注意。因為這一年，即1904年以降，《台灣日日新報》上以語言藝術為主的「文學」用例逐漸增多。雖然「文學」的複義並存現象在其後仍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隨著日本狹義文學的日趨成熟，台灣的言論界所流通的語言藝術概念與資訊也愈來愈繁盛。
9. 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頁215。該書主要選錄《竹內好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80~1982年）內的文章集結而成。
10.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原著出版於1929年）（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4年），頁22-26。



殖民進步主義邏輯的合理性」¹¹，竹內好所說的日本對西方「沒有表示出任何抵抗」，或許應該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結果是日本同樣循著優勝劣敗的邏輯，跟隨了西方帝國主義的政經思想與侵略行徑。游勝冠分析1895年後，日本如何透過殖民進步主義的思考邏輯，配置日本與台灣的權力位置，以及台灣知識階層如何回應與行動。其中，在關於傳統知識份子的分析裡，提到日本當局一方面貶抑漢文化價值，一方面透過酬唱往來及提供發言空間，讓傳統知識份子在確保文化尊嚴與社會地位的認知下，安於殖民者為他們設定的位置。並且指出，士大夫知識界所遵循的儒學道德觀及社會倫序，與殖民進步主義的等級觀有著同質性，這讓許多知識階層容易接受與再生產殖民者的論述，並藉以維護其階級身份。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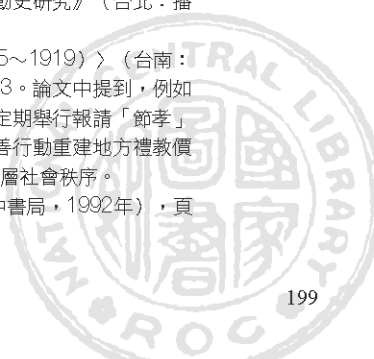
我們知道殖民者經常透過「文／野」的二元論，定位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差異，以維繫統治正當性。然試想殖民初期，儘管在甲午戰爭取得勝利，日本尚未完全取代中華帝國，建立起以日本為中心的文明圈威信。即使約十年之後，日本將在日俄戰爭中取得勝利，接著再過幾年會併吞朝鮮，成為不可一世的帝國主義國家，但在1895年，其所建立的強權自信仍然只是起步。雖有部分台灣士紳為了經濟利益附和當局，或安於統治者給予的特殊待遇，但日本官方要在儒學有不可撼動地位的台灣社會樹立其殖民文化的威信，仍不是件容易的事。當局或許能在武力及近代科技上顯示其優越性，卻難以立即說服台灣人：儒學這套學問不夠好。誠如先行研究所說，日本統治者在面對殖民地的傳統教育體系時有其困窘，對於台灣人而言，在文化上，日本這個殖民者並不具有絕對權威，其試圖強制台灣人學習的「國語」，不僅包含大量漢字，更可溯源被統治者的文化母國。¹³ 可以說，日本



官方藉以籠絡士紳的漢學、漢文，也是其建立支配性文化威信時最大的障礙，既無法貿然貶抑，又必須設法瓦解。到底，日本當局是如何構製出一個可行的論述，特別在殖民統治初期面對台灣人時，如何讓既肯定又貶抑的漢文化（尤其是在維繫士紳資望的「漢學」、「漢文」）論述得以合理成立？

台灣的文化與社會結構，大約在十九世紀中葉後趨近對岸，統合進中華王朝體制，隨之而來的，是長期維繫此體制的科舉制度也在台灣社會擴展。科舉制度確保中下階層向社會上層流動的機會，也培育了維持地方社會穩定的士大夫階層。¹⁴ 這批士紳階層藉由國家認定的學養與功名，獲得地方領導者的道德威信與實質的管轄權，而官方亦透過此階層的力量，協助推展各地方的「禮治系統」與施善事業，藉以打造並維繫一個文治社會。¹⁵ 過去中華王朝體制的官方行政活動大抵僅到達縣，其下則是以士紳為中心的地方自治，因此這個階層是官民之間的政治中介者，也是維持社會和政治整合的主要憑藉。¹⁶ 1895

11. 游勝冠，《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台灣解殖文學》（台北：群學，2012年4月），頁27-40。
12. 同註11，頁93-128。
13. 陳培豐，〈日治時期的漢詩文、國民性與皇民文學〉，收於《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6年），頁476。
14. 根據若林正文的分類，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上層約可分為：1、土豪（大地主、開拓指導者。擁有私人武力，負責保護勢力下的住民）；2、士紳（通過考試或以捐納獲得科舉頭銜或官位者）；3、其他的地主、商人等資產家。隨著清政府行政權力的確立及王朝統合力的增強，土豪轉型為士紳者，或地主、商人的士紳化也明顯增多。若林正文著，台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播種者，2007年），頁29-31。
15. 川路祥代，〈殖民地台灣文化統合與台灣傳統儒學社會（1895~1919）〉（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6月），頁49-63。論文中提到，例如當時官方制訂「鄉約」，並透過宣講方式普及各地，此外也定期舉行報請「節孝」活動，以此強化「地方—中央」的結合關係，並經常透過施善行動重建地方禮教價值，可以說官方相當依賴鄉紳階層的道德與能力，以此維持基層社會秩序。
16.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92年），頁71。



年，這樣的社會被迫脫離中華王朝體制進入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的士紳而言，這也「意味著失去了他們權威的終極依靠」¹⁷，他們或走向武裝抗日，或離台前往清國。日本當局則極力防止這個階層轉化為反日勢力，設法籠絡並利用其權威與自治組織以繼續穩定地方，而這種「籠絡」及「利用」，主要透過「去民族性」意義的儒學來進行。¹⁸

首先是日本殖民統治初期兩年，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的「混合主義」¹⁹教育方針，讓漢文、書房教育成為殖民者「同化」的輔助手段而保留下來。在伊澤離職後，其對書房教育的改良構想被延續並逐步實行，如附加日語課程、編寫有助於宣導天皇國家意識型態的漢文教材等。²⁰這不僅提供了台灣漢學與日本漢學的接點，讓日本近代天皇制國家的倫理觀、忠君愛國思想，與孔孟的人倫道德接合，也透過漢文的過渡，讓書房教育朝向與公學校教育整合。

另一方面，官方也透過「同文」之便，嘗試以漢詩文作為交流手段，與台灣士紳階層建立友善關係。楊永彬指出，殖民統治初期，日本政府似乎特意派任具漢學素養的官員來台，這些儒士官員在日本可能已失去發揮空間，但其漢學素養仍有助於日本對中國情勢的掌握及殖民地台灣的治理。尾崎秀真也曾回憶日治初期，總督府當局總是懷有一種不能輸給新附者台灣人的想法，因此來台官員個個都是漢文底深厚的文士。²¹而留在台灣的知識階層，或繼續向清國買官應科舉，或放棄傳統仕進，以其學養寄託詩文。這些人，後來多轉變為詩人，其中部分活躍者，和這些被派任來台的日本官員文士進行頻繁的詩文交流，各地也紛紛成立吟社，交流活動愈發繁盛。而報章媒體也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如日本統治初期的《台灣新報》設有文苑欄，提供台日詩文交流的平台。由於透過報紙的發行與宣傳，讓許多地方性



詩人的名聲得以播及全島，甚至遠至海外地區，這種媒體效果吸引更多投入報紙的課題徵詩，助長漢詩的興盛。此外，自首任總督府民政局長水野遵開啟官紳詩文酬唱的風氣後，各級官員及地方首長也多依循相同模式，因而這種雅會交際在台灣割讓兩年後的1897年已見盛況。²² 透過利用同文關係進行「同化」的教育策略、官紳的詩文唱和，加上紳章制度的實施，日本當局初步安撫並籠絡了部分台灣紳商階層。

1898年兒玉源太郎就任台灣總督，由後藤新平擔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眾所周知，後藤就任後即以鐵腕整頓改革。在改正官制裁撤千名冗官之後，台灣的官紳酬唱曾短暫中輟，但隨著報紙持續登載台灣文人的詩作，繼而吟社重整、饗老典的舉行，台灣社會漢詩活動又逐漸活絡起來。在此基礎下，總督府得以繼續運用類似的雅集活動收攬士紳並宣導政令。在後藤所整備的統治體制中，儘管基於「保存舊慣」的立場也同意保留漢文，漢文的定位與意義卻受到極大的重塑，乃至架空。

17. 同註14，頁30。

18. 同註14。

19. 「混合主義」是指透過台日「同文同種」關係，以漢文及日文並進的方法推行殖民地的教育，試圖引導台灣進入日本「國體」，達到「同化於民族」的目的。參考自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2006年），頁88。

20. 1898年11月日本當局制訂的關於書房的規定，明訂書房教育附加國語課程；此外陸續發行書房的漢文教材，如1898年發行的〈大日本史略〉、1899年發行的《教育敕語述義》等德育教科書。參考來源同註19，頁94。

21. 尾崎秀真，〈台灣四十年史話〉，《台灣時報》第213期（1937年8月），頁160。

22.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於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台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台北：播種者，2000年），頁39-42。

(二) 揚文會及漢文定位的變化

在兒玉任內由台灣總督府主辦的揚文會，於1900年3月15日在台北淡水館召開。該活動邀集全台具有生員（即秀才）以上資格的士紳，會前以「保存廟宇」、「旌表節孝」、「救濟賑恤」等題徵稿，由士紳事先完成後攜稿與會，會後再由主辦單位招待參觀台北的各機關與設施。前行研究對於揚文會「開闢土路，收攬民心」的實際目的已有許多闡述。其中，也指出這次活動中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演說，實已描繪出往後教育政策的藍圖，顯示當局「將保存中國固有『文』的傳統與導入日本近代教育的必要性揉合在一起，有條件地將台人收編進殖民統治的權力構造當中」。²⁴另外，也有學者分析當時台人的反應，指出在「同化」背後其實存在著台日之間「異心同體」的儒學觀，及其伴隨而來的「文明想像」差異。²⁵

這次活動中後藤新平的演說，主要目的是為了說服士紳階級配合當局，共同推展公學校教育。他在演說的開頭說明揚文會具「溫故知新」的意義，並引《大學》三綱領，強調知識階層須講求格物致知之理、具備不斷革新的積極，進而達到道德修養的至善境界，以此銜接「日新之學」的必要。後藤闡釋「揚文」意涵：

所謂揚文者，並非徒事虛文，乃發揚俗儒記誦辭章之習也。督憲閣下之意，在普及日新之學，文明之德，期與其民之福利，欲解世人炫惑新故之教育不一，使悟其道為一



理，方開此會。²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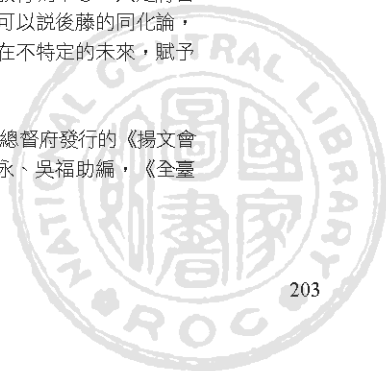
表示此會宗旨並非鼓勵不切實際的文辭酬和，而是要推動學問的更新與普及。由於當時台灣人對於新式教育仍顯遲疑，為此後藤希望說明新學特點以釋疑慮。他認為過去隸屬清國的台灣，與日本有同文關係，從文化親緣上來說，這並非單純異邦殖民的關係。進而，他談到日本的教育特色，闡述日本自古以來教育與國家同體，具有萬世一系的國家型態與歷史，因皇室的威信與臣民的忠義，讓日本未曾受過他國侵略與分割，得以長久保持國家完整，「固不與夫輒事禪讓、討伐者同日而論」。²⁷ 雖未直指，但後藤描述與對照的對象，顯然就是易姓革命的中華王朝，及其頻受外侮的現狀。他強調日本因國家本體堅實，且能適度融合印度、中國、百濟、西方等他邦文化，故能成為與時俱進的強國；而中國雖是世界古文明國，文教源遠留長，卻無法長久維繫，終致落後於時代。

24. 許時嘉，〈揚文策略下「文」與「文明」的交錯：以1900民揚文會為例〉，梅家玲編，《台灣研究新視界：青年學者觀點》（台北：麥田，2012年），頁117-147。該論文整理揚文會相關先行研究中具代表性的幾個觀點，如：總督府透過這些活動，將台人社會菁英階層納入基層行政與治安組織，建構出台灣社會的新領導階層（吳文星）；針對台人士紳舉行「改朝換代」儀式，使其透過「朝貢」式的北上活動，建構出新的認同（川路祥代）；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利用「同文」性，以「中華帝國的宰相」「擬似皇帝」的形式，模仿清朝封建政權的權力體系，藉此將台灣知識階層編入新的帝國統治秩序（齋藤希史）；後藤新平的演說，強調傳統漢文教育無法有效率吸收近代文明，政策上雖保存漢文，但以實業教育為中心，只是將台灣的近代教育視為殖民地地上經營獲得經濟利益的一種手段，可以說後藤的同化論，是將官方所說的「一視同仁」之實現日期，有前提條件約定在不特定的未來，賦予當下差別統治以正當性（陳培豐）。

25. 同註24。

26. 〈後藤民政長官揚文會演說〉（1900年3月15日），收於台灣總督府發行的《揚文會策議文集》（台灣總督府，1901年11月13日），引自黃哲永、吳福助編，《全臺文》（三十一）（台中：文叢閣，2007年）頁476。

27. 同註26，頁477。



由於當時台灣人仍多傾向將子女送到傳統書房學習，導致公學校教育推展的困難，因此後藤在演說中特意比較日本與中國的文教發展，說明公學校教育及學習日本語的優點：

公學校等之教育方法，雖與從來書房教授有不同，但道無二致，而新政其歸處固一也，是徵於教育之教諭炳焉。凡教育方法，譬如登高必自卑為貴，夫令幼童勞神於至難之默誦者，不得謂教化之得宜者也。如我帝國，只有四十八字，及自一至九之數字，方能自在，意思相通，且可容易記述解釋。余並非不識清國文學之氣韻高雅，尚且優美，又不是要廢棄漢學也，惟求四民易學易識之方法，以期普及易通，故與勞神於山川風月、紫水明山等之對句，寧可講究實學實用之方針，是余對諸君有所厚望焉。²⁸

後藤說明新舊教育的差別，在於公學校教育化繁為簡，讓學童更有效率吸收知識。他深刻瞭解漢人社會對於「漢文」根深柢固的敬慕與自信，因此不忘稱譽漢文傳統，並再度強調倡導新學並非要捨棄漢學，惟當務之急是教育方式及內容的實用化，希望與會士紳能夠理解、配合，並協助宣傳。

演說中所提到的「文」、「文學」，就後藤來說主要是學問、學術（包括漢學及其他「並列」的各國文明之學），以及詩文寫作。但對於聽眾的台灣人來說，「文」、「文學」，是以儒學為「主」的學術體系，而這個學問總體涉及語言文字、學問典籍、養成教育、道德義務、詩文能力等。可以說，「文」、「文學」、「漢文」、「漢



學」等用語經常具有這種總括性質，包含知識人的學問、修養、社會角色，同時也是社會地位。面對與漢文化根源的中國有更深厚關係，且漢文仍具高度權威的台灣社會，後藤的演說一方面必須表示尊重台人所認知的漢文優位，一方面也須從容展現日本文化的優越與自信，以建立總督府「充滿威信與慈愛」²⁹的形象。他所構築的文化政治關係得以順理成章，是因為將漢文的優位推向「過去式」，因而得以不帶任何緊張感地稱頌古代中國，讚譽漢文傳統的深度與優美，甚至大方承認其為日本文化淵源之一。顯然，將漢文擱置在古典與審美價值上，對於統治者來說無損威信，既證實日本文化的宏遠大度，也對其今日強國印象的建立無所妨礙。而後藤在讚美漢文辭章「氣韻高雅，尚且優美」之餘，其實也不忘附帶「俗儒記誦辭章之習」、「勞神於山川風月、紫水明山等之對句」等凸顯其形式化的評述。結果，這些「讚譽」只是不斷加深漢文的「非當代性」與「非實用性」。另一方面，他也從實際面向否定了漢文的當代價值，但僅強調教學層面的缺失——不易學、無效率，對聽者而言仍有解讀空間，這種說法並未否定漢學的博大精深與歷史價值，無損台人的文化尊嚴。可以說，後藤以相當安全的措辭，既表現出敬重，也溫和而徹底地對漢文進行了去權威化。

事實上這種對漢文定位的重整，特別是將其價值「古典化」，並非完全源自殖民地台灣統治體制的設計。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的自我形塑過程其實已經不斷反覆吞吐與再定義中華帝國的文明影響。由於日本統治階層基於儒教倫理的國民教化方針，陸續頒佈「教學聖旨」（1879）、「教育敕語」（1890），繼而推出重視日本古典及漢文的政策，帶來漢學興盛，伴隨而來的漢詩繁榮甚至超越江戶

28. 同註27，頁479。

29. 此為後藤事後回憶時談及，見許時嘉，〈揚文策略下「文」與「文明」的交錯：以1900年揚文會為例〉，收錄於梅家玲編，《台灣研究新視界：青年學者觀點》（台北：麥田，2012年），頁118。



時期。一八八〇年代漢詩文社團的組成及活動十分蓬勃，以政要為中心的活動不時舉行漢詩會，綜合雜誌通常也設有漢詩欄，甚至產生學習中國韻律的熱潮³⁰，並有各種題為「支那文學」的研究叢書陸續印行。而日本在建構國民文化及文明史上所需的「知」方面的傳統與資源，絕大多數都是漢文，因此在編寫日本文學史時也無法排除漢文傳統。此外也有研究指出，日本在十九世紀後半急起直追西方文明的時期裡，因為經常需要仰賴上海刊印流通的漢譯西歐學術書，且在學習英語上也常借助語順類似的漢文³¹，因此，漢文實際上並非如同一般對於明治維新的「歐化」印象般被迫退場。可以說，從一八八〇年代開始，到1895年以前，日本知識階層及領導階層的中堅，仍有不少人屬於深受漢學影響的世代，他們雖有意區隔中日文化差異，但較能正面看待中國的文明影響，並將其視為抗衡西洋的結盟資源。

不過另一方面，新式學術及日本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仍將傳統漢文教育逐漸推離中心。到了1894年時，日本官方在漢文教育中將背誦和作文從必修課取消³²，傳統教育裡的熟讀記誦典籍與文章能力，已不被視為必備教養。有別於過去的全方位訓練，傳統學術及教育形式於此時逐漸瓦解，漢文在當代學術中退化為一種古典權威——維繫君臣倫理的思想依據、「知」的文化源流、風雅傳統的正宗。

後藤的演說，正是在這種「古典權威」前提下承認漢詩文的優位，同時合理化其後退於時代的非實用性。但在此論述下，漢詩文的社會地位與生存空間基本上被確保了下來，於是延續殖民統治以來官紳雅集的風氣，透過報紙課題徵詩、總督府禮遇夙儒文士的活動等，讓漢詩人地位迅速攀升，甚至產生其作為詩人的榮耀感。³³相對於文化界的這種「殊榮」，官方教育政策的實際走向，則是將漢文教育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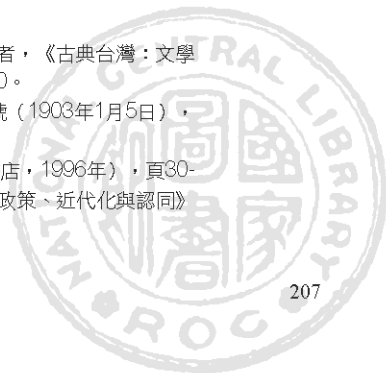


步解體，朝向「簡易、實用」的課程設計，並逐漸確立日本語的優先性。後藤的演說已呈示了這種政策輪廓，也初步架構出殖民地台灣的漢文定位。

教育界裡漢文的動搖，在不久後的漢文科廢止論爭上可見一斑。這場論爭的時間約從1900年至1903年，核心人物是橋本武（時任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教授）及平井又八（期間任大稻埕公學校教諭、台北師範學校助教授、台北第二尋常高等小學校教諭等），兩人圍繞著漢文能否承擔同化教育任務問題展開議論。簡要來說，橋本武強調自己是站在「國家教育的立場」³⁴，他否定漢文及儒學之於修身教育的功能，認為語言教育與精神感化是一體的，因此主張廢止漢文科，強化「國語」教育；相對於此，平井又八則肯定儒家經書的價值，不僅是其工具性意義，也正面評價四書五經在知識、學術上的價值，認為與其把教學重點放在日語的熟練與否，應更加重視精神的「日本化」，因此主張透過漢文及漢學經典，讓台灣人的精神感化更為深刻而確實。

先行研究透過這場論爭的探討，描繪當時殖民地官員的在統治方針上呈現的思想光譜³⁵，也指出對於統治者的「同化」政策而言，

-
30. 鈴木貞美談到，明治時期，日本人和中國人接觸機會變多，學習中國韻律的傾向也增強，1883年清朝王室早期下令編纂的《佩文韻府》的銅板印刷本在日本印行，加速中國古典詩韻的學習。同註3，頁145。
 31. 鈴木貞美，《日本の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日本的文化民族主義）（東京：平凡社，2005年），頁101。
 32. 同註3，頁147。
 33. 黃美娥，〈日治時代台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收於同作者，《古典台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年），頁190。
 34. 橋本武，〈平井又八君に答ふ〉，《台灣教育會雜誌》第10號（1903年1月5日），頁17。
 35. 如：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頁30-74。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2006年），頁95-100。



「漢文」已逐漸失去與「日文」平行而進的地位。³⁶ 除此之外，我們也能看到，在這場論爭裡頭傾向於保留漢文立場的言論，基本上同樣是側重在漢文能夠協助德育教化、作為思想的傳統資源等面向。這顯示對當時許多日人知識階層而言，漢文漢學作為一種必備而實用之「學問」的意義已不再，除了運用於殖民統治的工具性意義之外，其知識價值同樣被定位在古典權威的一端，成為歷史中的經典，而非當代之學。

不只橋本與平井的爭論，這時期圍繞漢文教育的討論，開始把許多漢文的負面論述帶入台灣的知識階層當中。這類言論不像後藤新平的演說，畢竟直面台灣士紳，多少還保持尊重與客氣，教育界人士之間的發言對話並無這種顧慮，因此不時流露出進步學者檢討儒學善否的視線。他們批評台灣儒學所形成的負面風俗——士人自我滿足於支那式的尊大³⁷、帶有宗教臭味的講道活動³⁸，或批評基礎教育缺乏智德啟發³⁹、實行上偏於枝微末節流於形式。⁴⁰ 即便是正面看待漢文價值的平井又八，也免不了認為儒學經典缺乏組織、系統及邏輯。⁴¹ 這些文章多發表於《台灣教育會雜誌》。在漢文科廢止論爭結束不久後，1904年3月，總督府公布公學校規則改正，漢文科獨立，授課時間由每週12小時縮短為5小時。這意味著官方對於漢文用於教學現場有所疑慮，且不再依賴漢文在同化教育上的工具性意義，其後該雜誌的言論也更趨向否定漢文教育。⁴²

《台灣教育會雜誌》是受總督府指導的「台灣教育會」（1901年6月成立）的機關雜誌，發刊於該會成立後的隔月，會員中有少數台灣人。在1903年1月該雜誌設置漢文報之前，台灣人會員約莫47人左右，漢文報設置後，台人會員迅速增加，到1904年1月時已有二百



餘人。⁴³ 這時期的台灣人知識階層，都還是受過傳統漢文教育的世代。他們在接觸大量、長篇幅，且採取新式學術之姿的漢文論後，或許未必會認同或附和這些言論，但勢必無法迴避，且更深刻感受到兩種知識體系的競爭，以及漢文從主流學術逐漸淡出的趨勢。

從揚文會後藤新平的演說，到漢文科廢止論爭、公學校規則改正，一個既肯定也貶抑的漢文論述，以及架空的台灣漢文走向明確浮現。官方立場的言論，一方面將漢文擱置在古典及審美價值上，並在此前提下保留漢詩文活動空間，藉由古典權威保全士紳階層的社會威望與榮耀感，使其在「改朝換代」後仍維持類似的社會角色。對於殖民者來說，漢學與漢文的功能，在於傳統儒學社會中的忠孝倫理需要被保留下來，且逐步轉化為天皇制國家的「臣民之道」，而這種階級秩序有賴於士紳階級對其社會地位的積極維護，以及對其社會「義務」的積極實踐。另一方面，則透過宣傳日本特殊的國體、歷史及文化特徵，配合新興建設與近代學術的展示，配置一個「中華帝國：古文明——積弱不振」、「日本帝國：與時俱進——今日強國」的對照。既藉此樹立支配文化的威信，並鼓勵台人認識新學、感受新舊文明的差距，也透過此差距，合理化漢文教育的「改革」，將漢文教育以簡易實用等名義弱化其教學內容，讓漢文傳統逐漸從當代學術中退

36. 同註19，頁100。

37. 前田孟雄，〈本島兒童教育上困難の一〉，《台灣教育會雜誌》第2號（1901年9月29日），頁39。

38. 高岡武男，〈公學校ノ修身ニ就ギテ〉，《台灣教育會雜誌》第4號（1902年3月25日），頁3-20。

39. 同註38。

40. 木下龍，〈本島教育に關する卑見〉，《台灣教育會雜誌》第5號，1902年6月25日，頁3-6。

41. 平井又八，〈公學校に於ける漢文問題敢て橋本君の教へを乞ふ〉，《台灣教育會雜誌》第7號，1902年10月25日。

42. 室屋麻梨子，〈《台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27）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6月），頁55。

43. 同註42。



場，乃至無以為繼。同時，給予台灣人「透過接受殖民者的文化，就可以克服差別問題」的幻想。⁴⁴然而陳培豐也指出，儘管後藤在揚文會演說中將台灣納入日本的「國體論」，強調「一視同仁」，但實際上他對台灣人的教育構想僅以實踐「商業帝國主義」為目標。因為該方針以實業教育為中心，反對公學校教材內容的提升，於是教育內容趨向差別化及低程度化。⁴⁵

這種朝向兩端的漢文發展，確保了「漢詩文教養」的社會地位，但在政策上卻讓漢文素養的培育漸漸喪失國家制度的支持。至於台灣人如何運用被保留下來的漢詩文空間，當然又是另一個問題。⁴⁶無論如何，經過日本統治最初的那幾年，傳統學術及教育體系即使尚未被摧毀，也已不再穩固，吸納「新學」成為新的趨勢，而新的「文學」概念也隨著這個潮流進入台灣知識階層的視域。

三、新學抬頭與「文學」的入場

(一) 新學的發展

統治者如何論述及配置權力關係，與被統治者如何認知因應，經常未必一致⁴⁷，但在官方允許的公開媒體上，還是會呈現某些統一的論調。可以看到的是，揚文會之後的幾年間，公共論壇湧現大量鼓吹「新學」的言論，這些文章大抵延續後藤演說中設置的文化關係與論述模式。對統治者來說，鼓勵新學是為了鬆動舊學的絕對權威，將台灣人教育導向配合實業發展的人力培育；對台灣的漢人而言，漢學與漢文的古典價值得以維繫其不容侵犯的文化自信，既然儒學傳統及固



有社會階層秩序受到尊重與保護，以其為本攝取新知，保持學問的活化與實用性，也就不是難以接受的事。對台灣士紳來說，面對被割讓的事實，儘管情感上仍多糾結，但在中國積弱不振與衰敗的現狀受到批評的情境裡，某種程度上或許也會緩和其向異族傾斜的不安，或產生亟欲改革傳統學術的渴望。於是在不同的因素與需求下，新式學術受到普遍的關注與討論，「新學」、「實學」、「文明」等詞彙頓時成為流行語，在知識階層之間被視為新的必備教養。

1900年揚文會結束後，《台灣日日新報》以「論新學宜如何振興」懸賞徵文，同年11月該報開始登載入選論文。根據編輯部所言，屆期之前應徵稿件「百有餘篇」⁴⁸，顯見當時風氣。由於經過報社評選，這些被登載的文章，在對中國的評論、西學的想法上，大多帶有官方論述的色彩，而對於振興新學的具體建議，大抵有：1、讓書房

44. 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頁71。

45. 同註19，頁122-125。

46. 漢詩文空間當然是出於日本官方的懷柔政策，但它其實也是日本自古以來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儘管與中國的關係變得微妙以後，漢詩文地位日漸下降，但既然被包攝於日本文化中，台灣人若非在統治者所預留的漢詩文空間中堅持自身的民族立場或特色，僅因持續有漢詩文活動，就意味著具有所謂民族氣節或反官方思想，可能都是過早的評價。關於這個問題的探討，請參考游勝冠，《近代肯定論·反抗史觀與人文主義——殖民化的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及其研究》（南投：普羅文化，2011年），頁37-107。

47. 日本統治前期仍是軍事統治，武裝反抗屢受日方彈壓，到了兒玉源太郎主政的時期，雖轉向招降政策，並重新設計警察維安制度，根據後藤新平的回憶，1897年至1902年間，曾逮捕並殺戮大量的台灣人（參考來源同註19，頁106-110）。由此，可以想見當時台灣社會的恐怖氛圍：比起大正時期，這時的台灣尚缺乏非武力社會運動的條件。誠如許多先行研究的提醒，當時台灣知識階層有不得不表面與日本政府虛應的無奈，即便是與日方友好的社會名流，如辜顯榮、黃玉階等人，尚且無法免於遭日方猜疑。（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2005年），頁397-398。）此外，也有先行研究分析，像揚文會這樣的活動，後藤用心構造的統合論述，似乎並未受到台灣文人的關注。以吳德功為例，其基於傳統儒學的「格物致知」接受「文明化」，對於後藤強調的天皇意識型態適用台灣儒學社會的言論，反應其實並不熱烈。（川路祥代，同註15）。

48. 台灣日日新報社漢文部，〈懸賞論文〉，《台灣日日新報》，1900年11月3日。

教師學習新學後於地方教授，以書房教育銜接公學校教育⁴⁹；2、集資購買新學圖書設置文庫；3、於各地開設講述會；4、設立新學研究組織等。其中研究會的成立很快就實現，1900年11月蔡國琳等人在台南組織「新學會」，1906年台北也有伊藤政重、洪以南、王慶忠、古火旺、羅秀惠、黃茂清（植亭）、謝汝銓（雪漁）、李書（逸濤）、李漢如、陳履坤等以《台灣日日新報》漢文記者為主力共同發起的「新學會」，其他地方也有小型研究會的消息⁵⁰，但以這兩個「新學會」較具規模。不過，根據前行研究考察，這一南一北新學會的運作並不是很順利，參與者在推動會務上態度略顯消極，其配合政府政策宣示效忠的目的可能大於實質成效。⁵¹

儘管如此，從這些活動訊息及同時期媒體上關於新學的報導與討論，我們可以初步了解當時台灣人對於新學的認知，以及言論界新學論述的大致走向。首先，當時台灣人所追求的「新學」，主要包含哪些內容？從當時的相關文章可以看到，「新學」是指相對於「舊學」，被認為適用於當代社會的「實用之學」，包含：1、新文字語言。即當時的「國語」（日語）。各地新學會的報導都列有學習研究「國語」的目標，如台南新學會的「國語記事」、鹽水港的新學研究會有「和文讀法」及「和文作文」、台北新學會預定發行的叢刊裡有「國文界（和漢對譯）」項目等。⁵² 2、新學術。包含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各種學問，如法學、文學、經濟、宗教、地理、政治、軍制、行政、萬國史、醫學、農學、工學、天文、化學、電學、算學等。⁵³ 3、新觀念。如近代國家觀念，人的獨立、平等、自由，以及競爭、功利等思想。⁵⁴

在多數言論中，這些新式學問並非被用以取代「舊學」，而是



「就古法以擴充之」⁵⁵，以舊學為本，適度擴增實用之學。知識階層大多能認同「以新學益智，以聖教修身」⁵⁶的知識立場，在批判舊學流弊，接受西學制度、學術的同時，也有不少人試圖從中國傳統制度及學術中尋求類似性與關連性。這種傳統學術本位，因為既有社會秩序及知識階層的社會角色尚未有劇烈變動，而得以維繫下來並穩步進展。同時，傳統學術中存在的士大夫菁英主義也被延續了下來，並決定了這些維新言說的性質，這個部分我們稍後會分析說明。

新學與傳統儒學知識體系的連體，可以說是日本殖民者與台灣知識階層，基於各自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種言說模式。這也迫使台灣的傳統學術與日本的近代學術匯流，導致許多台灣漢學漢文論述逐漸日本化或泛亞洲主義化。日本近代學術的特徵，與其向近代國家轉型的體制設計關係密切，即以「尊皇」、「近代化」（西化）為基調。⁵⁷ 明

-
49. 以書房教育銜接公學校教育，事實上在幾年前統治當局制訂書房改良規定時已開始進行。當時官方試圖推動日文教科書的漢譯本，如《大日本史略》、《教育敕語述義》、《天變地異》、《啟蒙其窮理圖解》等書，而資料也顯示，後兩者與科學相關的圖書，經常被塾師所擱置。（資料參考來源同註19，頁94）這可能是提議讓書房教師接受新學訓練的理由。
50. 如1906年鹽水港的沈崑山招集當地人共約20人左右，設立新學的研究會，聘請日人教師，課程時間是每晚8~11時，內容包括：和文讀法、漢文讀法、和漢作文、算數等。編輯部，〈設研究會〉，《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6年3月9日。
51. 謝崇耀，〈論日治時期新學會之發展與時代意義〉，《台灣風物》57：2（2007年6月），頁57-88。
52. 相關訊息分別登載於台灣日日新報編輯部，〈新學會序〉，《台灣日日新報》，1900年4月25日；編輯部，〈設研究會〉、〈提倡新學〉，《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6年3月9日及6月28日。
53. 參考自台灣日日新報編輯部，〈新學會序〉，《台灣日日新報》，1900年4月25日；鄧旭東，〈論新學宜如何振興〉，《台灣日日新報》，1900年11月3日；周德臣，〈論新學宜如何振興〉，《台灣日日新報》，1900年11月3日；編輯部，〈提倡新學〉，《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6年6月28日。
54. 梯雲樓主，〈論新學貴端其趨向〉，《台灣日日新報》，1903年1月11日；忠告生，〈偽文明〉，《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5年10月24日。
55. 梯雲樓主，〈局外慨嘆〉，《台灣日日新報》，1899年3月4日。
56. 翔山衣洲，〈論新學會〉，《台灣日日新報》，1900年3月25日。
57. 陳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年），頁12。



治初期，儒學雖然在日本國學與洋學的擠壓下失去主流學問的地位，但隨著歐化潮流與自由民權運動的高漲，讓備受威脅的明治政府意識到必須修正教育方針，並試圖從儒學傳統裡尋求思想資源與對策。對於統治者而言，過去儒學教育培養個人自發性的道德約束，恪守家庭、社會、國家的倫理規範，在維繫井然有序的社會及支持君權原則上，無疑提供了最理想的意識型態支持。隨著「教育敕語」的頒佈，儒學的道德準則重返教育核心，忠君愛國思想被置於國民教育的至高點，連同1889年公布的帝國憲法，在體制上確立了天皇的宗教性權威，並以國體論牽制國民對自身權利的要求。明治中期的這波漢學回潮帶有強烈的國家主義因素，由於對「西洋」的警戒與憂心，讓漢學對內朝向日本化，淡化中國的文化根源性，強調天皇制國家文化歷史之特殊性與優越性，以維繫日本的國民認同；對外則朝向泛亞洲主義化，以其作為「東洋傳統」、「東洋文明」根據，泛亞洲主義雖然包含各式各樣的思想，但基本上都期待亞洲各國能形成與「西洋」抗衡的聯合勢力。隨著日本民族主義的發展，後來也出現了以「東亞」為名，將過去的中華中心置換為日本中心的企圖，這後來也成為日本對外擴張的思想依據，同時，漢學也在這些侵略行動中成了統合工具。可以看到，日本官方所設計的「近代」，基本上圍繞「尊皇」原則，融合國學、挪用漢學、吸納西學，再透過思想檢查與取締，過濾、排除任何動搖「國體」的成分，這讓中國漢學與西方學術思潮在配合日本國情的需要下受到修整或再造。

日本殖民者允許存在的，是這種弱化中國性的「漢學」，以及壓抑自由民權思想的「新學」。於是借「同文」之名，對台灣傳統知識體系進行換血。如前所述，其目的是台灣人的精神日本化，並透過基



礎教育，讓台灣人具備簡單程度的國語能力與基本知識，培養殖民地統治機構末端的人員及實業發展的人力。而台灣的漢人知識階層則借「同文」之名，試圖維繫漢文漢學的發展。無論其對殖民統治認同度如何，對他們而言，漢文漢學的維繫，既關乎民族也關乎個人身家的確保，孰輕孰重或許因人而異，但維繫此文化資本得以存續的目標是一致的。於是不斷出現挾日本漢學或東亞漢學以自保的論述⁵⁸，就是在鼓吹新學時，也不忘強調新學的本務在於「審教育之精神，以推求國體所在」。⁵⁹

不難想像，所謂「國體」、「我日本」、「東亞同文國粹」等日本化或泛亞洲主義化的言論，也許只是面向殖民者的說詞。特別是，在泛亞洲主義的言說裡，其實也存在著以中國為中心，或以日本為中心的曖昧性，值得進一步區別與探討（如果我們可以謹慎細膩對待1937年以後戰爭時期的寫作、戰後戒嚴時期的中華民族主義論述，或許也就毋須全盤接受言論空間及社會運動條件仍緊縮的統治初期那些附和官方政策的言論）。但無論如何，當時知識階層之所以運用這些言論模式，或熱心吸收新學，主要目的不外是延續漢學的當代價值，而這同時也是延續其社會角色的當代價值，我們或許也可以將

58. 典型的例子，如麓蕉（羅秀惠）在〈漢學保存會小集敘書後〉一文中，首先談及世界各國學校，最重視的教育科目即「國文」。他對「國文」的定義是「本國相沿之文字，歷古相傳之書籍」，認為固有的國文即便隨著時代變化不盡適用，也會被保存流傳，而不是毀滅，就像日本對待漢文的方式。在將「漢文」定位為日本重要文化資產後，他也針對漢學與新學的關係，分析漢學的保存價值與必要性：「蓋西學之才智技能，日新不已，而漢學之文字經史，萬古不磨，新故相資，方為萬全無弊，否則心醉歐風，頓忘東亞同文之國粹，恐不免有經籍道熄，網淪法蠹之憂，言念及此，不勝大懼」，是具代表性的言論。麓蕉（羅秀惠），〈漢學保存會小集敘書後〉，《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5年7月4日。另外，關於台灣知識階層這方面的動向，可參考游勝冠，〈同文關係中作為日本性的漢學——日治時期漢文人對其文化資本「漢學」的挪用與接稼〉（南投：普羅文化，2011年），頁37-69；薛建蓉，〈日治時期歷史小說研究——以台灣報章雜誌漢文小說為考察對象研究〉（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8月），頁49-132。

59. 梯雲樓主，〈論新學貴端其本務〉，《台灣日日新報》，1900年4月26日。

此視為一種士大夫身份的進化。傳統士大夫承擔下傳上意、上傳下意的政治中介任務，承擔這種任務的正當性及執行這種任務的目的，都在於掌握文化資本，以及維繫階層分明的禮治社會。這些知識人或許從傳統科舉文士，轉換為新的身份：區街莊長、保正、官署職員、教師、記者，但維護這個等級秩序及支撐它的學說，仍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們的民族色彩或許會在公開言論中模糊化或消失，但在維持傳統階層社會秩序上卻少有退讓，這在他們接受新知識與新思潮時，對既有綱常倫理的極力維護與堅持上可見一斑。⁶⁰ 顯見這些知識人在接受新學的同時，尚未打算卸除士大夫身份，而這種秩序觀與自我定位，讓部分反思人我關係的近代思潮難以真正滲透。就在這種孕育蛻變，但實質上比較接近儒學傳統本位主義的自我擴建裡，大量的新詞彙與學說被引介，現代意涵的「文學」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作為一種「文明」事物被接納了進來。

(一)「文學」內質的變化

1、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的連載

先前我們談到，日治初期的出版品裡已見廣狹義文學並陳，但語言藝術文學觀的「文學」用例，大多出現在日人的文章。台灣知識階層在接收新學時，也開始使用作為新式學科的「文學」概念，較早的用例見於上述1900年「論新學宜如何振興」的徵文⁶¹，但僅是新式學科的羅列，並未涉及各學門的內容。1906年台北新學會計畫發行固定雜誌，內容預定為：



- 新學界（法學、經濟、格致、宗教、地理、政治）
 國聞界（內外大事記）
 新史界（即詞苑及所有通儒寄稿）
 評論界（即學術新刊諸短評）
 新智界（附解頤錄數種）
 小說界（最新譯本短篇（劄）記）（兼附電版圖書）
 國文界（和漢對譯）⁶²

其中「詞苑」主要收於「新史界」，可推測與當時《台灣教育會雜誌》這類雜誌中的「文藝史傳」類似，是刊載漢詩、和歌、雜文的單元。而「小說界」獨立設置，並未與詩賦雜文並列於同一範疇，也未見這些文類被統稱為「文學」，可見在台灣知識階層間這樣的觀念尚未形成或固定下來。新學會的運作及刊物發行，在1907年因李漢如赴對岸創設《全閩新日報》而中止⁶³，直到1910年才又重整旗鼓。

60. 如梯雲樓主在〈論新學貴端其趨向〉中指出，時人經常誤解西學中的獨立平等競爭自由等思想，而失之狂妄、輕薄、奸危、浮蕩，其中「平等」的部分，其針對的問題是「蔑視倫常，肆無忌憚，平日於列邦治體未嘗會意，惟聞歐美制度貴賤上下行禮大都從簡不拘泥乎繁文，私心竊以為便，於是父母可疏也，尊長可侮也，越分亂齒之端庸流所不敢顯蹈者，彼等且毅然倡之…」，表示對於倫常動搖及人的品格失之輕薄的憂心。梯雲樓主，〈論新學貴端其趨向〉，《台灣日日新報》，1903年1月11日。另外署名忠告生的〈偽文明〉，也談到台灣人在接受國家功利自由博愛等觀念時的問題：「今台灣之醉心日化主義，翹翹然文明自命者，除國家主義一端，因支那民族素乏國家觀念，姑作罷論外，其餘三者，亦無不惟妙惟肖。蓋只知有利，不知有義，則不失為功利派之人；子可以訟其父，妻可以訟其夫，則不失為自由派之人；飲食嬉游相徵逐，聚黨呼群重然諾，則不失為博愛派之人」，以反諷口吻批評固有道德倫理的淪喪，也同樣無法接受傳統三綱五常所維繫的階層秩序逐漸動搖。忠告生，〈偽文明〉，《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5年10月24日。
61. 其中鄧旭東的文章裡對新學的把握是「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文學、醫學、農工各學」，鄧旭東，〈論新學宜如何振興〉，《台灣日日新報》，1900年11月3日。
62. 編輯部，〈提倡新學〉，《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6年6月28日。
63. 編輯部，〈官紳記事〉，《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7年5月5日；〈全閩新日報將出世〉，同報，1907年8月3日；〈全閩新日報發刊〉，同報，1907年8月30日；〈全閩新日報之衝突〉，同報，1907年12月13日；伊藤政重，〈發刊之詞〉，《新學叢誌》第一號（台北：新學研究會，1910年8月），頁1-3。

1907年，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漢譯版（由謝雪漁翻譯）開始在《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上連載。眾所周知，西歐各國於十八世紀末開始，出現編寫本國文明史的潮流，以作為凝聚國民文化認同的教材，而這些文明史經常以「一國文學史」的形式被呈現出來。十九世紀末受西方思想體制影響的日本和中國，也陸續編纂本國文學史。由於西歐各國的「文學」，與經學體系中的「文學」似有重疊又非一致，因此在這個過程中產生重新確認「文學」內涵及範疇的迫切需求，並在新式學術的框架下，從歷代文獻中尋索適合的文化資料予以重新描述。由於日本傳統學術深受中國儒學影響，在確立「日本」的同時，也出現了各種中國研究，其意義既是重整與詮釋漢學傳統，也是重新釐清日中界線。於是，在產生「日本文學史」的同時，亦出現不少「中國文學史」（當時慣用「支那文學史」），其中部分著述後來也影響了中國的本國文學史編寫。由此來看，中、日近代「文學」課題的出現，是因為在跟隨西歐模式過程中，試圖建立新學科、撰寫國民教材、累積相同的文明內容，因此產生重新辨別「文學」內涵外延的需要，以便重整自身的文化資源。然而，一九〇〇年代的殖民地台灣並沒有這種經驗，也不具備撰寫「本國文學史」的空間及條件，而是透過既成的「日本文學史」、「中國文學史」或其他國家的文學史，認識新式學術脈絡下的「文學」。

至於早期被介紹進來的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在日本先後幾批「支那文學史」著作中是什麼樣的存在？回溯明治時期較早出版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其實大多是接近「學術史」性質的研究。例如，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學略史》（1882年出版），該書主要勾勒與探討中國先秦的學術；兒島獻吉郎編寫《支那文學史》，以1891~1892



年由同文社出版的版本為首，以及陸續完成的多部中國文學史，其討論對象同樣是以「學問、文章」意涵為主的「文學」，且特別推崇「經」的價值。甲午戰爭後，以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1897年）為首先後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如藤田豐八、笹川種郎（臨風）、高瀨武次郎、久保天隨等人的中國文學史研究，則明顯從傳統「學問、文章」的文學研究，朝向西歐各國文學史的取材及研究模式，對語言藝術的探討有較多關注，且受到泰納《英國文學史》的「種族、環境、時代」分析原則的影響，對中國的人種、性格、地理多所評述，並有明確區分日中文化差異的傾向。這些以新學術及研究方法所呈現的見解，其實也延續了過去日本國學中區別「和」、「漢」的諸多論述（如中國重「理」，日本重「情」等說法），並漸漸發展成談論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時的基本設定。這些中國文學史研究者當中，藤田豐八與久保天隨在一九二〇年代後也來到台灣，任職於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久保天隨（1875~1934），本名得二，1896年考進東京帝國大學漢文學科，善作漢詩，且有英語、德語及西歐學術的根底。其大學時已有文名，經常在《帝國文學》發表中國文學研究、漢詩、評論等，後來在1898年也曾擔任該誌的編輯委員。1899年畢業後，他選擇以著述為業⁶⁴，前後出版多種書籍，其中與中國相關的研究數量相當龐大。久保撰寫的《支那文學史》有多種版本，最早由人文社出版（1903年11月），其後也有平民書房版（1907年3月）⁶⁵，兩者內容結構大致相同。期間幾年，也有早稻田大學出版的講義錄版《支那文學史》⁶⁶，若對照目錄及內文，可以判斷《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上連

64. 參考自芳村弘道，〈久保天隨とその著書『支那文學史』〉，收於川合康三編，《中国の文学史》（東京：創文社，2002年），頁63。

65. 台灣圖書館（前身為台灣總督府圖書館）的館藏為此版本。

66. 目前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有1904年（1903年撰）、1905年（1904年撰）、1907年（1906年撰）、1909年等版本。



載的版本，是1904年撰寫的講義錄（「早稻田大學三十八年度文學教育科第二學年講義錄」）。

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的主要特色，是對於「文學」、「文學史」的認知與界定，較之前行的古城貞吉、藤田豐八、笹川種郎等人，更趨向脫離經學傳統。他批評先行的文學史大多只是作家小傳、書籍解題，主張運用社會學、心理學、美學、修辭學等知識，對藝術的內容與形式進行研究分析。⁶⁷ 1904年《太陽》雜誌有一篇大町桂月撰寫的書評，該文亦附和久保天隨的想法，批評當時許多文學史著作對「文學」、「文學史」意涵的把握不夠清楚，往往將文學與史傳、哲學混同，也缺乏將「文學者」與歷史家、能文者、古典學者、語學者等區分的明確認識。⁶⁸ 可以看到，久保更為明確地強調了「語言藝術」的觀念，他相當重視過去較少被觸及的小說戲曲，特別在中國戲曲上投注許多精力。⁶⁹

此外，如上所述，1895年前後出版的這批中國文學史都有明確區分日中差異的特徵，且積極評述中國的人種環境特質。其中一個常見的談法，是從中國南北風土差異，探討中國國民性及文學的形成與發展，認為中國北方人種講求實用，而這樣的保守及實際性後來成為中國人文的主要特徵。這種觀點始自藤田，並影響了笹川、久保。然而，久保較之前行者，更加徹底否定儒家的寫作觀，他認為中國文學受到「保守精神」及「形式主義」所制縛，「大都標榜教訓的旨意，不發自由之感情，時流淺薄卑近之弊」。⁷⁰ 在談到《詩經》時他這麼說：

為漢族祖宗之上古北人，其實際的傾向，既表彰於萬事，



而其及於文學，則更有甚焉者，彼希臘時代，學者之論詩也，為模倣自然界，或模倣人間界者，支那人則反是，專以之供教育之用。詩之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也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也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也困，故政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無比詩為近者，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後人倫，美教化，移風俗」。⁷¹

他認為漢族重視實際，詩歌多傾向教化性質，並引用《詩經·大序》佐證，認為《詩經》所收盡是「教訓的抒情詩」，且這種寫作規範造成「抒情」很大的限制與束縛：

既以教訓的旨趣，為唯一之要諦，以故感情之發洩，不得自由，而必循從於道德的規矩也。孔子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司馬遷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其為哀樂者，絕非到於極點，方吟詠之時，亦不無大加檢束，且彼周人之虛飾的絕非露至純之感情，如此由倫理的關係，所發出親愛之情，為意志之力所制裁，其在形式的，過半止於禮義之中，現於各篇，而其內容，敬

67. 久保得二，〈支那文學史〉，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05年（1904年撰）。久保天隨述，謝汝銓譯，〈支那文學史〉，《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7年7月18日。
68. 大町桂月，〈天隨の支那文學史を評す〉，《太陽》10：1，1904年1月。轉載自芳村弘道，〈久保天隨とその著書『支那文學史』〉，收於川合康三編，《中國の文史》（東京：創文社，2002年2月），頁68-69。
69. 同上。
70. 久保天隨述，謝汝銓譯，〈支那文學史〉（二），《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7年7月19日。
71. 久保天隨述，謝汝銓譯，〈支那文學史〉（十八），《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7年8月8日。



天畏命之念，儼然存在。

…戀愛教訓的抒情詩，是為矛盾之尤甚者，何則，戀愛之極致，則超過現在社會之利害，所詮藝上之美，必不能與道德上之善一致也，戀愛為絕好之詩的題目，尚為如此，其他可知矣。⁷²

久保認為因道德倫理的優先性，使詩歌往往受限於「意志之力」，而無法自由流露與表現真性情。他批評最常出現這種矛盾的，就是不能跨越道德規範的戀愛詩，因為戀愛的極致，是「超過現在社會之利害」，這種「美」，必然無法與「道德之善」一致。這裡我們彷彿看到日本德川時期國學者本居宣長（1730～1801）的儒學論述，他批評日本德川時期學術主流的儒學，過於以「道理」束縛詩歌，妨礙「真實人情」⁷³的表現，並認為描寫「非道德戀情」——可視為人情的極限，使讀者感受到「物哀」，即因「物」（客觀世界）而觸發的幽情、哀愁等情思，是日本詩歌、物語的特色與價值。可以說，這種日本文化本位主義的立場，是藉由強調主流儒學及漢文的嚴肅性質，及日本文化的重「情」傳統，讓「漢／和」劃分得以成立。這種論述有著鮮明的文化民族主義色彩，從一開始就與日本主體確立的需求緊密相連，因此這些描寫挑戰道德界線的人性、欲望，既是從中國儒教道德解放，也是向另一個重新建構的秩序體制附著就位。換言之，其將「人情」描寫視為一種感性而優美的傳統而接受，並承認這種表現的正當性，但「人」附屬於政體及其倫理規範，個體之間的相互承認並未擴及所有階層，且多數個人無法真正參與或批評共同體走向等種



種性質，和過去傳統秩序（儒家道德所規範的社會）並未距離太遠。這種帶有日本文化民族主義特徵的重「情」傳統，與後來西歐的浪漫主義有容易連結的特質，但對於「人」的定位與想像卻有著極大的差異。

這些國學論述以各種形式延續下來。例如，被視為日本近代小說發展前導的坪內逍遙《小說神髓》（1885年），批評過去流於勸善懲惡的書寫模式，主張小說應以描寫「人情」為主眼，其次則是描寫世態風俗，此說亦可視為日本國學論述中區分「和／漢」模式的延伸。坪內也以史賓塞的進化論為根據，解釋小說優於詩歌、戲曲的理由，說明西歐近代現實主義小說潮流。這種論述上的統合，將「『人情的真實』與作為西歐近代技法的現實主義等同視之，把真實描寫人情世態的現實主義統一起來作為理念」，但僅講述現實主義「手法」，而未觸及作為小說根本的「思想」課題，可以說是一種「只有技巧的藝術觀」。⁷⁴作為一個典型的例子，其同樣顯示出日本重「情」傳統論述，與西方文學觀念交集時的某些違和，亦即這種重「情」傳統與描寫手法，一方面獲得「西方文明」的背書，一方面在掙脫「中國的」儒家傳統道德觀的同時，其實仍舊沒有碰觸到「人」如何徹底卸除封建身份這個最關鍵的近代課題。究其原因，這時期作家們所關注的課題，與其說，是「人」在社會制度中的困境與突破之道，實則是表現問題，即對於「人」的深刻挖掘與真實刻畫；或與其說，他們將關注點放在「人」的主體確立，卻有更多比重是放在「日本」這個主體的確立。這兩種偏向——專注於「個人」，或朝向「國家」，在寫作目的與手法雖有差異，但共通點是不會直接挑戰現有的政治體制。

72. 久保天隨述，謝汝銓譯，〈支那文學史〉（十九），《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7年8月9日。

73. 指人的心理、感情、本能欲望。

74. 同註3，頁171-179。



久保天隨等人的中國文學史研究，基本上也是延續這種區分「日本／支那」的論述手法，而這種檢視批判儒學傳統的「文學」觀念，又會對台灣知識階層帶來什麼影響？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漢譯版在《漢文台灣日日新報》的連載，從1907年7月18日起，到1908年3月19日止，共150回，僅刊載到「六朝文學」。文後附記表示，截至目前所刊登的是「前編」，尚有「後編」唐代到清代的部分，由於該報的編輯考量，決定自此停載。1910年元旦，該報又出現即將續刊的預告⁷⁵，但後來並無下文。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漢譯版《支那文學史》連載的期間，翻譯者謝雪漁撰寫了〈文學辨義〉一文，可視為台灣知識階層對經學傳統「文學」與新學脈絡「文學」交集後的一次知識重整。

2、謝雪漁〈文學辨義〉

謝雪漁這篇文章發表於1907年10月28日的《漢文台灣日日新報》，該文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首先，他談到古今東西「文學」的定義，指出過去中國和日本的「文學」大抵都是指「學問之總稱」，而西洋則是「文法」及「學問之總稱」；至於日本近來的變化，則可看到帝國大學文學科的內容，包含法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對此，謝雪漁僅是陳述並無探討，但隨即針對「文學」定義的各家說法進行區辨分析。

謝雪漁引用幾位國外學者的觀點並予以評論，這些人包含：一、威武士他（Joseph Emerson Worcester, 1784~1865），其所編纂的字典中對「文學」的解釋，是指經由觀察、思想、想像的寫作，或指一切印書書籍（但排除實驗科學著作）。範圍稍微縮小的話，是指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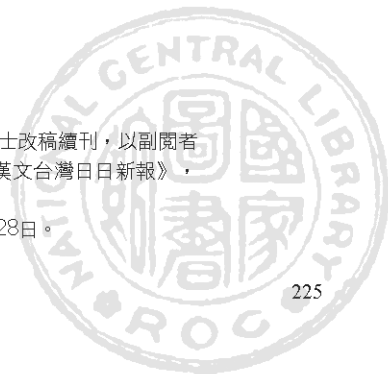


文，偏重於雅趣及感情（但抽象議論、純粹學術的文章除外）。謝雪漁認為這種強調思想、想像、美、情感的「文學」並算不完全，只能說是狹義的解釋。二、毛里呂在《歐洲文學》的序論裡，解釋「文學」是特殊科學、專門技術以外的所有著述。但謝雪漁認為，這個範圍又過於寬泛，容易把純粹記錄的文字也涵蓋進來。三、波斯烈卓（H. M. Posnett, 1855~1927）在《比較文學》中，認為所謂的文學，較之思考，更重想像；較之教化實效，更重使多人感到樂趣；較之表達特殊智識，更重表達普通智識。但謝雪漁認為，把重點放在閱讀樂趣，容易排除一些「精妙之文學流著作」，並不妥當。四、阿老呂羅，認為文學的對象並非特定階層的人，而是眾人，且並非透過深奧言語，而是能平易表達思想的言語。謝雪漁也認為此說無法充分說明文學的性質。五、啟呂真愚，其將著作分為科學性（訴諸理解力、智識），以及詩性（訴諸人之空想，動人之感情）。謝雪漁認為其中「詩性」作品約莫就是「文學」範疇。⁷⁶

最後，在這些基礎上，他試圖整合和重新界定「文學」的範圍，於是將其分為：狹義（純文學）：「訴諸人之情感，而表出其美思想，使惹起人已皆同之情感空想者」；廣義：指傳記、哲學、文學評論、史論等。較之以經學為依歸的寫作傳統，謝雪漁把握了「文學」的近代特徵，即重視人的情感表現，且文字表現需講求「美」，而傳統的「教化」也被代之以「感化」，強調對閱讀者的影響，需有「動人」的感染力。事實上這種廣狹義文學的解釋方式，在同時期的中國也開始出現，並且同樣有主情、主美、面向閱讀者強調「動人」等特徵。但是，謝雪漁並不特別強調面向眾人，與同時期中國學者在思考

75. 「……前年停刊之支那文學史，此後將由本報編輯長伊藤學士改稿續刊，以副閱者之雅望。……」，編輯部，〈雜報·豫告閱報諸君〉，《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10年1月1日。

76. 雪漁，〈文學辨義〉，《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7年10月28日。



「文學」時的關注略有差異。⁷⁷而我們又要如何理解或說明謝雪漁這種四平八穩的整合，進以分析這種「文學」觀念與中國及日本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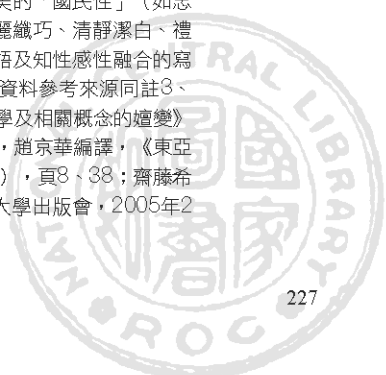
若從日本及中國現代意涵「文學」的出現，與其確立近代民族國家過程息息相關的認識來看，或許可以提供一種解釋。先前我們談到，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雖然陸續有西方文藝思潮的引介，但很長一段時間仍是以廣義文學（綜合漢學知識傳統與西方人文學觀念）為主流。一八八〇年代中期後，這種與「學問」相關的文學觀念，才慢慢轉換為「藝術」概念的特殊領域。明治二〇年代（1887~1896）雖存在廣狹義文學之爭，但支持廣義文學概念的作家，不少是站在啟蒙主義立場，批判那些經常以戀愛為題材，強調想像、描寫技巧的小說家與評論家，主張文章應具備思想性、理念性，設定更廣大的讀者階層，提供民眾健全娛樂，並適度融合知識啟蒙與經國濟民的思想。這種主要面向「國民」的廣義文學立場，帶有民族主義的基調，其實並不難理解。相對於此，比較微妙的是日本美文學的追溯與研究，以及那些力圖推進狹義文學概念的作家，他們在批判儒學傳統「保守」、「實際」、「教訓性質」的勸善懲惡文學觀束縛人性及情感時，或許也帶有人文主義或自由主義的思想色彩，但從他們透過各種近代學術包裝的偏見定義中國人種及文化特徵來看，其思想與主張背後的民族主義基調，同樣是鮮明強烈的。可以說，日本學界及言論界，儘管存在廣狹義文學立場和手法的差異與爭論，但在建構一個「日本獨特的民族文化」上是齊步的。⁷⁸至於晚清民初的中國就更不用說了，近代「文學」的課題，同樣是出現在確立近代國家體制的過程中。而由於其領土廣大且民族組成的複雜，使其在凝聚國民文化



認同上，始終都必須面對語言的統一普及與思想傳播等種種困難。因此，現代意涵「文學」在中國的發展，自始就肩負著「面向讀者」的任務與課題。

然而，當時的台灣人並未面對這種「文學」課題，毋須自行完成新式學科體制、撰寫本國文明史，也就無從產生辨別「文學」與重整文化資料的迫切要求，因為沒有成立自己民族國家的可能性，也沒有台灣本位國民運動的發展條件。日治初期的台灣人，不是因武力抗爭

77. 比較中國在同時期或稍晚對「文學」的摸索與解釋，可以看到「廣泛的讀者階層」始終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如黃人《中國文學史》（1905）中「文學者雖亦因乎垂教，而以娛人為目的」、「文學者當使讀者能解」；《普通百科新大辭典》（1911年）中「注重在動讀者之感情，必當始尋常皆可會解」的說法都有這樣的特徵。引用自鍾少華，《中文概念史論》（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2年7月），頁38-40。
78. 我們可以概略地回顧這樣過程：1885年坪內逍遙《小說神髓》，延續日本國學排斥儒學的論述，將真實刻畫人情世態與西歐近代現實主義的「技法」統一起來，作為一種寫作理念；1889年芳賀矢一的《國文學史十講》，撰寫了有別於過去偏向「學術史」的文學史，強調站在「和文」、「美文學」立場，並減少漢詩文的比重，與中國文化根源性拉開距離；1890年三上參次、高津敏三郎合著的《日本文學史》，強調日本固有性、本國語言之美，並跳脫日本向來對「文字」起源於中國的顧慮，淡化文字起源之於文學的重要性；1895年上田萬年〈國語研究に就いて〉（關於國語研究），將西歐各國以日常語言為本位的語言民族主義，與日本國學從古代發覺純粹日本語的理論結合，取得日本確立「國語」的合理性；1896年竹越與三郎《二千五百年史》，針對中國的象形文字，嘗試論證「聲音文字」在世界史上的優越性，以及日本的聲音文字（假名文字）才是長久以來真正深入日本民間的國民語文；1897年前後出現一波「支那文學史」撰寫風潮，結合西歐各國文學史的模式，並採用日本國學區分「漢／和」的論點，批評儒學以道理束縛詩歌，壓抑「人情」，定位「支那文學」的非文明性；1907年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裡，論述日本國語之美，分析使用優美國語的日本人，長年來已形成優美的「國民性」（如忠君愛國、崇拜祖先注重家名、喜愛草木自然、樂天灑脫、纖麗纖巧、清靜潔白、禮儀作法、溫和寬恕等）。在這些著述言論中，優美的日本國語及知性感性融合的寫作傳統所成就的「優美的日本國民性」漸漸確立下來。以上資料參考來源同註3、註19，以及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年），頁41-81；子安宣邦著，趙京華編譯，《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8、38；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漢文脈の近代）（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5年2月），頁23。



遭肅清，就是默守漢民族意識，或努力讓自己具備可以參與日本近代國家的國民資格。於是，知識階層的公開言論，只能朝向國家及少數識字階層，或是面向個人抒發，這般兩極化的發展。而這其實也是傳統士大夫最消極的處世方式，積極者或許還能以民為本，議論時政傳達民意，但以當時台灣的言論空間，很難容許這種社會角色的存在。即便是如謝雪漁這麼積極參與日本國家體制的人，也曾因為「思想有錯」而被外派眠埠（馬尼拉）。⁷⁹ 不難理解，在這種文化活動的條件下，台灣知識階層只能就儒學傳統進行改良與內涵擴充。這是何以謝雪漁在整合了一些新觀念之後，無法將之醞釀成帶有挑戰體制規範意義的思想資源，最多只是表現出批判傳統儒學的「教化」性格，或接受有限度的人權觀念，卻無法啟動一種帶有民眾聯絡性與參與公論的書寫行動。這種大環境的制縛，要到十多年後的日治中期，才能看到一些突破。

回過頭來重新觀察謝雪漁廣狹義調和的「文學」論，我們可以從中把握住幾個特徵：1、「文學」是幾乎涵蓋所有人文學科領域的優秀寫作；2、關注情感的表現；3、美文觀念；4、關於書寫的社會功能，從教化轉變為感化，強調語言的感染力。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跳脫以中國經學傳統為依歸的寫作傳統，但實際上也是載道教化的一種轉型，只是在道德內容與手段上有所改變；5、在傳統「文章」範疇中追加小說、戲曲；6、並無面向廣泛讀者層的意圖。這種「文學」概念與傳統學術脈絡的「文學」最大的差異，在於「學問」的成分大幅萎縮，加上尚情、尚美的價值取向，讓「聖人之道」再也不是唯一的標準。可以說，「中國經學」與「寫作」的結合與否出現了彈性。當然，我們不能忘記，與中國經學傳統拉開距離，也可能意味著只是



將「聖人之道」替換為日本天皇國家意識型態。在往後好幾年的時間裡，台灣人言論界大抵延續著這種廣狹義調和的「文學」用法。

四、結語

從這些發展脈絡來看，1907年，也就是在日本統治台灣約12年左右的時間點，台灣知識階層之間對「文學」一詞已開始出現廣狹義調和的用法。在此發展裡可以看到，知識階層一方面擴充了既有知識領域，大量吸收新學術與新觀念，一方面仍受制於時空條件，無法跳脫消極士大夫的角色，對許多新概念只能進行一種知識性的整合與羅列。由於無法運用新的思想資源，反思並移除舊社會的包袱，進而推動社會變革，最後依然只能維持朝向國家與少數識字階層，或面向個人表現的書寫實踐。儘管日本的政治體制充滿限制，但這種矛盾的「近代化」，對「人」的社會身份的轉換，還是帶來了些許空間。特別是在進入一九二〇年代後，由於政治環境、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傳統知識階層有朝向積極意義士大夫角色轉換的機會與條件，而新的世代對「人」權利的思考與認知，以及閱讀習慣、感覺、審美價值，也有了巨大的變化。於是，新的人我關係、人與國家的關係開始被要求，而那些過去被禁制的環節，如人的表現自由、公論管道、人我聯絡媒介，也逐一被鬆脫。這些思想特徵與行動模式，是促使新舊文學論爭發生的主要關鍵。然而，新文學真的可謂「新」嗎？在評價上，可能也需要有所保留。這些文化變革，經常以「自由」、「平等」為原則，但隨著階級衝突，在現實上往往淪為空泛口號。結果，知識階層的行動依舊只能朝向特定階級的需求，也顯示其進步思想的深層，

79. 關於謝氏被外派的始末，請參考蔡佩玲，〈「同文」的想像與實踐：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謝雪漁的漢文書寫〉（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9年7月），頁79-85。



有著傳統菁英主義與秩序觀的變形延續。關於這些新舊衝突的細節，以及新文學開展後「文學」概念的爭論，將另文討論。

參考資料

一、文獻史料

- 《にひたか》（台北：にひたか社，1899年10月10日～1900年3月5日）。
- 《台灣時報》（台灣總督府，1898年～1945年）。
- 《台灣教育會雜誌》（台灣教育會，1901年7月～1911年12月）。
- 《台灣日日新報》（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898年～1945年）。
- 《台灣文藝》（台北：台灣文藝社，1902年4月5日～1902年9月29日）。
- 《高山國》（台北：高山國社，1898年11月3日～1899年7月28日）。
- 《揚文會策議文集》（台灣總督府，1901年11月13日）。
- 《新學叢誌》（台北：新學研究會，1910年8月、12月）。

二、專書

（一）中文專書

-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1992年）。
- 林豪，《澎湖廳志》（原刊於1893年）（台北：大通書局，1987年）。
- 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台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台北：播種者，2000年）。
-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2005年）。
- 梅家玲編，《台灣研究新視界：青年學者觀點》（台北：麥田，2012年）。
- 許俊雅主編，《講座FORMOSA：台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台北：萬卷樓，2004年）。
-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編，《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6年）。
- 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年）。
- 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2006年）。

賀昌盛，《晚清民初“文學”學科的學術譜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黃美娥，《古典台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年）。

黃哲永、吳福助編，《全臺文》（三十一）（台中：文昕閣，2007年）。

游勝冠，《近代化肯定論、反抗史觀與人文主義——殖民化的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及其研究》（南投：普羅文化，2011年）。

———，《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台灣解殖文學》（台北：群學，2012年）。

薛紹元，《台灣通志》（原刊於1894年）（台北：大通書局，1987年）。

鍾少華，《中文概念史論》（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2年）。

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二）外文專書（含譯本）

川合康三編，《中国の文学史観》（東京：創文社，2002年）。

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東京：人文社，1903年11月）。

———，《支那文學史》（東京：平民書房，1907年3月）。

久保得二，《支那文學史》（早稻田：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04年）。

子安宣邦，《日本近代思想批判：一國知の成立》（東京：岩波書店，2003年10月）。

———著，趙京華編譯，《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原著出版於1929年）（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4年）。

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

若林正丈著，台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播種者，2007年）。

鈴木貞美，《日本の「文学」概念》（東京：作品社，1998年）。

———，《日本の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平凡社，2005年12月）。

———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



- 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
- 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5年2月）。
- 權藤震二，《台灣實況》（東京：東京法學社，1896年）。

三、論文

(一) 期刊論文

- 柯喬文，〈文學成史：殖民視域中的久保天隨與其支那文學史〉，《中極學刊》第六輯，2007年12月，頁45-66。
- 謝崇耀，〈論日治時期新學會之發展與時代意義〉，《台灣風物》57：2（2007年6月），頁57-88。

(二) 學位論文

- 川路祥代，〈殖民地台灣文化統合與台灣傳統儒學社會（1895～1919）〉（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6月）。
- 室屋麻梨子，〈《台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1903～1927）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6月）。
- 蔡佩玲，〈「同文」的想像與實踐：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謝雪漁的漢文書寫〉（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7月）。
- 薛建蓉，〈日治時期歷史小說研究——以台灣報章雜誌漢文小說為考察對象研究〉（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8月）。

四、其他

- 文瀾（廖漢臣），〈從「揚文會」談到「新學研究會」〉，《台北文物》8：4（1960年2月），頁39-42。

